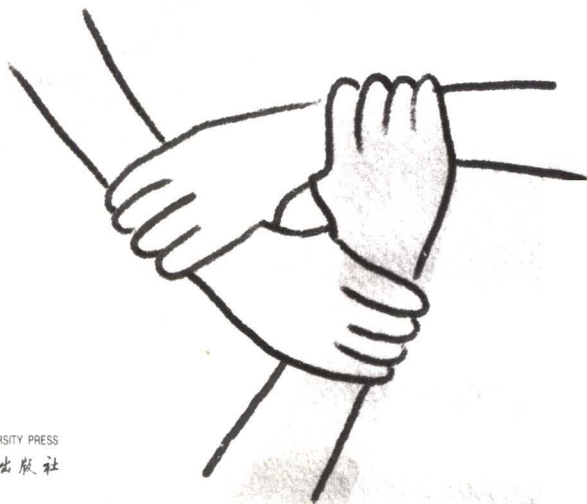


教育与心理科学研究文库

· 蒋士会 唐德海 编著 ·

当代教育理论 前沿问题概览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教育与心理科学研究文库

· 蒋士会 唐德海 编著 ·

当代教育理论 前沿问题概览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教育理论前沿问题概览 / 蒋士会, 唐德海编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7

(教育与心理科学研究文库/陈时见主编)

ISBN 7-5633-4092-0

I. 当… I. ①蒋… ②唐… II. 中小学—教育理论 IV. G63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50924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 541004)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cn>

出版人: 萧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桂林中核印刷厂印刷

(广西桂林市八里街 310 小区 邮政编码: 541213)

开本: 890 mm × 1 240 mm 1/32

印张: 12 字数: 320 千字

2003 年 7 月第 1 版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 ~ 1 500 定价: 2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总 序

新世纪的来临带来了不小的震荡,我们已深切地感受到新世纪社会变革浪潮的澎湃及其对教育提出的前所未有的期望。近些年,教育发展也着实很快,不仅教育改革风起云涌,一浪高过一浪,而且新的教育层出不穷,理论丛林不断翻新。我们置身于这样快速发展的时代,既感无限的欣喜,也觉时代的重任。

教育正处于转型与变革过程中,我们既面临对现有教育的全面反思,也面临新教育的建设。无论是教育理论工作者还是教育实践工作者,都应该承担起这一双重的历史任务。这一历史使命对于长期致力于教育事业发展并把教育视为终身追求的事业的我们而言更显凝重,并成为驱动我们不断奋进的动力。

广西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的学人们正是受到这一历史使命的感召,在教育改革大潮中不断进击,凝聚成一股蓬勃向上的力量。在这一力量的推进下,多年努力的积累也就转化成这套“教育与心理科学研究文库”。

大约 20 年前的一个丰收季节,一棵幼苗在中国南方的雨季里破土而出,伴随这棵幼苗的成长,一批又一批教育学子在一个又一个丰收的季节里诞生与成长。一阵欣喜之后,走过近 20 年的广西师范大学教科院在不断成长中重新思考它的发展与未来,于是就有了生存与发展的大讨论,有了左右为难的疼痛,也就有了对未来方向的界定与选择。今天,相对弱小的教育系变成规模

宏大的教育科学学院,无论是规模还是速度,都已不是当年的教育系所能比拟,但长期累积下来的资源着实成为后续发展的基石。面对世纪的变更,面对社会的昌明,面对教育的重建,广西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又迎来了一个更新的发展选择。本套研究文库不仅是多年累积的结果,也是对教育变革的一种回应,更是对事业发展进行思考的一种选择,这是对未来的选择。

结果、回应与选择并非一种因果关联的链环,但却凝聚了一批长期致力于教育事业的人们对教育变革的期望和期望视野下努力的艰辛。也正因如此,这套文库的作者主要集中在同一个群体,聚集在广西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未来发展的旗帜下,研究的领域既包括教育科学,也包括心理科学,研究队伍既有年长或者资深的教授,也有相对年轻但已崭露头角的学子。他们从不同的视角对不同领域进行细致、深入的研究,有的侧重对现实的反思,有的侧重对发展的梳理,有的侧重对理论的重建,领域不同,方法各异,视角多样。

文库的构思、形成和成稿,均得到了全国教育哲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陆有铨教授和全国教学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广西师范大学原副校长郭道明教授的悉心指导。他们作为文库的顾问,一直关心着文库的写作与出版,他们对文库所给予的关注和所付出的辛劳,对于文库的顺利完成无疑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文库的出版得到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他们的开拓与敬业精神和对学术长期以来的关注和扶持,是文库得以出版的重要前提。正是他们的倾力支持和艰苦劳动才使得本套文库得以酝酿、成形与面世。在此特别感谢他们所付出的心力。

“教育与心理科学研究文库”编委会

2002年1月

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教育理论界的同人坚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在教育科学研究领域里,贯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在批判地继承优秀的传统教育理论基础,积极地译介、引进国外教育理论发展的新成果,教育科学研究领域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各种理论流派、各种观点、各种学说相互碰撞、交汇、融合,新的理论像雨后春笋,层出不穷,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的理论视野,更新了人们的教育观念,促使人们突破传统的教育思维模式,从崭新的视角思考教育问题。这些理论成果涉及教育活动的各个层面,对教育实践进行着全方位的引领与指导。

但长期以来,教育理论界与教育实践界存在着“两张皮”的现象。一方面,由于固有的学术传统的影响,有些理论研究成果或所阐述的原理失之于深奥,或学术语言失之于晦涩,导致其学术色彩过于浓厚,不易为广大教育实践工作者所掌握。教育理论工作者也受到了来自实践界的“理论研究脱离实际”的埋怨与指责。教育理论对教育实践的预测、解释、指导、控制的功能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教育理论的研究似乎成了多余的学术活动,遭受许多非议。另一方面,许多理论工作者针锋相对地指出,实践工作者无视理论的巨大作用,不学理论,不懂理论,不用理论,盲目地实践,导致实践中出现种种的混乱。这种争执在上世纪 80 年代末

90年代初达到顶峰。至今,这种争论仍没有销声匿迹,仍在一定程度与范围内存在着。“教育理论与实践相分离”的争论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也引起了教育理论工作者的深刻反思。

理论来自实践并最终服务于实践。如果理论不为广大的实践工作者所掌握,理论的功能难以发挥,理论的价值与魅力何在?在当代中国,教育实践正进行着前所未有的改革。教育改革的实践迫切需要理论的指导与规范。教育实践者的改革热情急需教育理论工作者理性地引导,只有这样才不至使教育的改革失去方向,出现盲目与混乱,陷入越改越乱、难以自拔的泥潭。只有在科学的教育理论指导下,才会有科学的教育实践;只有在科学的教育理论指导下,教育实践工作者才能将自己的实践由自发的、经验的层次提升到自觉的、理性的高度,积极主动地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的要求,变革自己的实践。新的教育理论不应只存在于少数教育理论家的头脑中,或者仅成为少数教育学者谈论的话题,当然更不应仅蜷缩于少数面目深沉的学术刊物中。它们需要走向复杂多样的教育实践,为广大的教育实践者所理解、掌握、运用,并从中获得修正、完善与发展。只有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具体结合,才能焕发出教育理论的魅力,教育理论也才能不断地生长。

然而,教育理论是分层次的,提倡教育理论与实践结合,并不是笼统地指所有的教育理论都与教育实践直接结合,甚至“混合”在一起。因此,不能苛求所有的教育理论都与教育实践发生直接的具体的联系。有些教育理论对教育实践的指导是直接的具体的,有些教育理论对教育实践的指导需要通过许多环节的转化。“教育理论下嫁”的工作显然迫在眉睫。

对于教育理论工作者来说,为广大教育实践工作者遴选出当代教育理论中重要的、成熟的、典型的理论,以向他们系统地介绍,便于他们学习与掌握,这既是一项重要的任务,也是教育理论工作者应尽的职责。由于前面所述的原因,在教育理论研究领域里,向教育实践工作者深入浅出地介绍当代教育理论的研究成果

的书不多。而当代教育理论发展学派林立,观点纷呈,有些理论较为成熟,有些理论尚需发展,并需检验。因此,如何除纷去繁,摘其典型,确是一件困难之事。我们编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力求把握时代的脉搏,以审慎的态度透视当代教育理论五彩斑斓的花园,从中撷取精英,提供给广大教育实践工作者,为推动教育改革的深入尽一点绵薄之力。

本书撰写之际,正值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深入之时,它以服从和服务于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之需为根本宗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明确指出要“开展以培训全体教师为目标、骨干教师为重点的继续教育,使中小学教师的整体素质明显提高”。加强教师继续教育,增强教师的素质,建设一支优质高效、结构合理、相对稳定的教师队伍,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任务。这里介绍的当代教育理论研究的新成果、新思想、新观点、新理论,对于更新广大教师的教育观念,形成符合时代精神的教育理念,转变他们的教育行为与方式,全面提高他们的整体素质很有帮助。为此,本书的撰写坚持以下原则:

一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介绍新教育理论的同时,尽可能地结合一些案例进行阐释与说明,增强理论的理解性与可读性,为广大教育实践工作者提供一些具体的实践策略与建议,既从理论上澄清他们一些模糊的认识,纠正他们一些错误的观念,也从实践上为他们提供一些可供参照与分析的范型。

二是全面介绍与重点突出相结合。尽可能地在书中将当代教育理论研究的新成果介绍给广大的教育实践工作者,以便他们了解当代教育理论发展的概貌。但由于当代教育理论流派纷呈,因此,很难在一本篇幅不大的书里对当代所有教育理论的新发展、新成果予以详尽的介绍。因此,本书介绍的是一些成熟的、重要的理论成果。

三是普及与提高相结合。本书的撰写力求深入浅出,晓畅易懂,用科学、准确的语言阐释教育理论,为广大教育实践工作者提

供理论指导,培养他们的教育理性。但同时,也注重理论的逻辑性与系统性,在注意本书的可接受性的同时,也注重逐步提升教育实践工作者的理论素养,培养他们的理性思维。

由于编写者水平有限,书中不足之处在所难免,在此真诚地希望各位读者在使用过程中批评与赐教。

编著者

2003年3月

目 录

第一章 素质教育论	(1)
第一节 素质教育的发展探迹	(1)
第二节 素质教育的含义与特性	(22)
第三节 素质教育的实施	(38)
第二章 主体性教育论	(60)
第一节 主体、主体性及其基本特征	(60)
第二节 主体性教育概述	(65)
第三节 主体性教育的目的	(71)
第四节 主体性教育的过程	(77)
第五节 主体性教育的教学模式	(83)
第三章 情感教育论	(92)
第一节 情感教育的内涵	(92)
第二节 情感教育的价值	(107)
第三节 情感教育的策略	(115)
第四章 创新教育论	(134)
第一节 创新教育的内涵	(134)
第二节 创新教育的环境与氛围	(142)
第三节 创新教育的模式	(146)
第四节 创新教育的实施策略	(155)
第五章 环境教育论	(168)
第一节 环境教育概述	(168)

第二节	中小学环境教育	(176)
第三节	环境教育中的师资培训策略	(190)
第六章	教育质量与效益论	(195)
第一节	教育质量	(195)
第二节	教育效益	(210)
第七章	教育公平论	(222)
第一节	教育公平的历史发展	(222)
第二节	教育公平的理论内涵	(228)
第三节	教育公平的实践追求	(251)
第八章	闲暇教育论	(258)
第一节	闲暇与闲暇教育概述	(258)
第二节	闲暇教育的原则	(274)
第三节	闲暇教育的实施	(278)
第九章	教师专业化	(294)
第一节	教师专业化概述	(294)
第二节	教师专业素质构成	(308)
第三节	教师专业化的实现	(323)
第十章	终身教育论	(338)
第一节	终身教育概述	(339)
第二节	终身教育的实践	(350)
参考文献		(371)
后记		(376)

第一章

素质教育论

第一节 素质教育的发展探迹

一、素质教育发展概况

素质教育的理论形成于当代中国,但是素质教育的思想发展在中国却有漫长的历史。先哲们在教育实践中,不断地探索与思考,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经验。在这些经验中,孕育着丰富的素质教育思想。

西周时期的教育注重提高人的多方面素质。古代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课程,就体现了对人的素质的多方面的要求和培养。孔子注重理想人格的塑造,追求真善美多方面素质的培养。他所追求的理想人格是“圣人”。“圣人”人格的核心素质是“仁且知”^①。他所培养的“君子”则是品德高尚、精通“六艺”“文质彬彬”的德才兼备的人才,其核心要素是“仁、知、勇”^②。孔子提出的“性相近”“习相远”的素质发展观,“有教无类”的教育均等思想,“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学而时习”“学思结合”的为学之方,“启发诱导”“举一反三”的教授之道,“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治

① 《孟子·公孙丑上》:“仁且知,夫子既圣矣。”

② 《论语·宪问》:“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又《论语·为政》:“君子不器。”即不局限于一才一艺。又《论语·雍也》:“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学精神,都蕴涵着丰富的素质教育精神,可以说是素质教育的思想萌芽。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除孔子以外,孟子、荀子、董仲舒、韩愈、朱熹、王阳明、颜元等许多教育家,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素质教育思想财富。但是受阶级或历史的局限,他们所提倡的素质教育思想归根结底是为培养统治阶级所需要的人的素质,维护封建政权及士大夫们个人自我完善服务的。由于古代教育与生产劳动相分离,受教育者只是少数贵族阶级子弟,社会的知识积累相对简单,因此,提高的是少数人的素质。劳动人民的子弟多数未能受到正规的教育,只能在家庭和社会生产生活中有限度地提高自身的素质。科举制度的推行,制约着受教育者的潜能的充分发挥,也使受教育者个体的素质变得褊狭。这显然不是我们今天所提倡的素质教育。

在中国的近现代,伴随着国运的兴衰,教育思想家们对国人的素质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著名学者蔡元培强调国民教育应以“养成共和国健全人格”为根本目的,主张“五育”并举,全面实施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提倡发展个性与崇尚自然,要求按儿童“性质之动静,资禀之锐钝”而施教,促进儿童个性自然地自由发展,反对“教者以预定为目的,而强受教育者以就之”及注入式的教育。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提出“生活教育”理论,主张“教学做合一”,反对教师“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和学生“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强调培养学生生活实践能力与创造能力,发出“敲碎儿童的地狱,创造儿童的乐园”的呐喊,提出“五个解放”(头脑、双手、嘴巴、空间、时间)、“五路探讨”(行动、观察、看书、谈话、思考)和“每天四问”(我的身体有没有进步?我的学问有没有进步?我的工作有没有进步?我的道德有没有进步?)的要求,针砭了我国传统教育的痼疾,开启了新教育的大门。幼儿教育专家陈鹤琴首倡“活教育”理论,将教育目的划分为依次递进的三个层次,即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最终归结为“做现代中国人”。而现代中国人必须

具备五个条件:一要有健全的身体,以寓道德学问;二要有建设的能力,恢复文化科学事业;三要有创造的能力,重新唤起被旧制度束缚了的中国人的创造能力;四要能够合作,牺牲个体之小我,以成全民族之大我;五要有服务心,肯为社会造福。他还将“活教育”的教学过程分为四个步骤:一是实验观察,二是阅读参考,三是创作发表,四是批评检讨。这就将教学过程不仅视为接受间接经验的过程,而且是学生通过自学、实践,发展自己创造力的过程,凸显学生的主体活动在教学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像这样立足于实践,注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发挥学生的主动性,解放学生的动脑,重视学生的探索与创造的教育思想,在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想史上众多教育家都有共识。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由于政治、经济、战争等社会因素的影响,他们的这些进步教育思想很少能付诸实施,成为教育现实。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展开,教育实践有了较大的发展,为素质教育思想从理论到实践奠定了社会基础。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其进程缓慢,挫折亦多,发展道路曲折。

第一阶段:“文革”前 17 年,应试教育盛行。

学生负担过重和片面追求升学率的状况在“文革”前 17 年就普遍存在着。1952 年,我国开始实行全国统一考试制度。1953 年,教育部决定办重点中学,新中国的教育逐步走上了有序发展的轨道。但伴随而来的是出现了以应试和升学为目的的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教育现象。我国政府曾多次公开指出学生课业负担过重及片面追求升学率的问题,并采取过一系列措施,力图解决这些问题。例如,1955 年 7 月,教育部发出《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指示》,指出了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种种现象,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措施与办法。1963 年 1 月,教育部又发出《关于当前教学工作中的几点意见》,要求各地制止片面追求升学率的错误做法。1964 年 5 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发的教育部党组《关于克服中小学学生负担过重现象和提高教育质量的报告》指出,

近来中小学学生负担过重现象有所发展,有些情况相当严重,最突出的现象是课程门类多,课外作业多,测验考试多,致使学生常常处于被动与紧张状态。

学生负担过重和片面追求升学率等问题,曾引起毛泽东的重视。毛泽东于1953年6月指出:“现在初中学生上课的时间也多了一些,可以考虑适当减少。”^①他还于1964年3月10日在“北京一个中学校长提出减轻中学生负担问题的意见”的批示中指出:“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进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②

20世纪50年代中期,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由苏联介绍到中国,教育要促进学生全面而生动活泼地发展的问题引起广泛的重视。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所提出的“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③,对教育工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广大教育工作者在党的教育方针的指引下,为提高受教育者德、智、体等方面的素质,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在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克服片面追求升学率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然而,十年动乱期间,不仅否定了前17年的教育成就,而且造成了教育事业的倒退与混乱。正常的考试制度被破坏,缩短了学制,“精简”了课程,似乎解决了片面追求升学率和学业负担过重的问题,但其实是为一代人的素质带来了难以弥补的缺憾。

第二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素质教育”概念的提出。

自1977年逐步恢复全国统一考试的高考制度、研究生培养

^① 毛泽东:《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7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② 毛泽东:《毛泽东论教育革命》,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

^③ 毛泽东:《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780~7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制度和学位制度,1978年恢复重点学校制度以来,全国的教育教学秩序迅速得到恢复,教育质量不断得到提高。与此同时,学生课业负担过重和片面追求升学率的问题又严峻地摆在人们的面前。邓小平于1978年4月《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学生负担太重是不好的,今后仍然要采取措施来防止和纠正。”在谈到考试问题时指出:“对于没有考好的学生,要鼓励和帮助他们继续努力,不要因此造成不必要的精神负担。”^① 针对不少学校为追求升学率而忽视大多数学生的教育的状况,邓小平在1979年的教育工作会议上还提出了“要尽可能把全班学生教好”的思想。不久,时任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在全国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中小学教育要面向全体学生”^② 的要求。“中小学教育要面向全体学生”的思想,对教育界尤其是中小学教育产生了深刻影响。

“素质教育”一词最早出现在《教育研究》1982年第10期中的《德育过程的阶段说》一文。文中的“素质教育”是指对学生的道德素质教育,显然与我们现在的“素质教育”的含义有一定的出入,但毕竟提出了“素质教育”这一重要术语。1985年在讨论《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时,时任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用过“素质教育”这个名词。1987年,《贵州学院学报》第2期发表了题为《人才素质与素质教育》的文章,这是报刊标题中最早正式出现“素质教育”一词。1988年第11期《上海教育》(中学版)发表了评论员言实的《素质教育是初中教育的新目标》一文。该文指出:“现在最主要的任务是如何全面提高初中毕业生的素质,把素质教育作为初中教育工作的一个基本目标来抓。”并提到素质体系包括政治素质、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身体素质和劳动素质等。尽管该文素质教育的概念还不完善,但在素质教育问题的探讨上无疑迈出了可喜的一步。自此以后关于素质教育的探讨文

① 邓小平:《邓小平同志论教育》,67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

② 蒋南翔:《中小学教育要面向全体学生》,载《人民教育》,1979(6)。

章越来越多,素质教育逐渐成为一个专门的问题领域,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

20世纪80年代,素质教育逐渐成为一种教育思潮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的。20世纪80年代初,面对新的技术革命的挑战和世界教育改革的宏观背景,为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人们深切意识到劳动者素质的重要性,人的“素质”问题成为当时国内外学者探讨的一个新话题。1985年5月19日,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同年5月27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1986年4月12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三条规定:“义务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努力提高教育质量,使儿童少年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为提高民族素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奠定基础。”《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既是全社会的任务,更是基础教育的任务。”中国共产党十三大报告明确提出“使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上述文件和法规,都强调提高民族素质是教育的根本任务,强调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对科技发展、经济振兴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意义,从方针、政策和法规的角度,确认了素质教育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为构建素质教育理论奠定了基础,也为实施素质教育指明了方向。

第三阶段:1990~1999年,素质教育的深入探讨与全面实施。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小学素质教育研究广泛而深入地展开,专门探讨素质教育的文章日益增多。从1995年起,有关素质教育方面的文章可谓铺天盖地,素质教育专题研讨会不断召开。如1991年江苏省率先在全国召开素质教育研讨会。1993年10月,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管理研究会中小学整体改革专业委员会